

数十万印度农民“向德里进军”

农业改革引发政治危机 农民“常驻”首都抗议

印度德里首都区的东西两侧,分别是北方邦和哈里亚纳邦两个省级单位。在面对外敌时,可以用“拱卫”形容两邦与首都的关系。可到了内乱时,“拱卫”瞬间变“包围”。

从11月末开始至今,数十万印度农民在“向德里进军”的口号下从全国各地奔赴德里,针对印度总理莫迪的农业改革进行大规模抗议。其中,来自德里周边两个邦的约30万人构成这次抗议运动的主体。

农民长期是莫迪最重要的票仓,却怎么开始焚烧莫迪的画像?莫迪为印度改革弊政的梦想,还有成真的可能吗?



抗议者在临时驻地烙饼,拒不撤退。

“向德里进军”公路变身社区

德里与哈里亚纳邦交界处的高速公路通常很繁忙。但近半个月来,这里的公路上不再有川流不息的景象,浓郁的“生活气息”取而代之。

截至本月9日,难以计数的农民驾驶着卡车、拖车和拖拉机,停留在这条公路上,队伍至少长达3公里。在这支车队的两头,一端不断有新鲜血液加入,另一端则是印度军警设下的层层路障。这些路障由漆成黄色的厚重铁栅栏组成。为防止农民使用重型车辆冲击,铁栅栏往往厚达三四层,且层层紧贴。

铁栅栏的一侧,是高度戒备的军警,另一侧则是试图冲进德里的农民。在逐渐彼此适应对方的节奏后,农民渐渐放弃直接冲击的打算,转而就地驻守,改打“阵地战”。

于是,一幕幕奇特的景象出现了:各式各样的车辆胡乱地停放着,人们从车上取出面粉、蔬菜,拿出烤炉、煎板,在公路上烙饼吃。有的人即便是参加抗议,也依然注重自己的仪表,借着汽车后视镜整理仪容。洗完衣服怎么办?在车与车之间拉上一根绳子,把头巾、衣物和被褥统统晾在上面。还有人干脆把拖车后备厢改造成卧室,一些虔诚的信徒甚至还带了祈祷用的帐篷。

总之,印度人民充分发挥灵活机变的主动性,不仅把交通干线变成了生活社区,而且相对艰苦的生活条件丝毫没有减少他们的抗争热情。得益于100多个团体,尤其是左翼的组织和帮助,农民情绪高涨,不断高呼“革命万岁”的口号。还有一些人在拖拉机等“重型装

备”的掩护下,尝试突破重重封锁,进入首都。

在首都市区,示威者在街头聚集,焚烧莫迪的画像、塑像,高喊口号。军警则不断靠高压水枪和催泪弹驱散人群,逮捕示威者。

8日,示威者更是发起为期一天的全国大罢工,农民们封堵全国主要公路、枢纽和铁路长达数小时之久,并得到教师等其他不少工会的支持。

据印媒报道,德里警方已申请临时征用6座体育场,以关押越来越多的被捕者。

改革低效体系 农民深感不安

莫迪对这种局面并非没有预估。自9月农民抗争陆续爆发以来,莫迪政府已“预防性地”逮捕了100多人。

这一局面的出现,直接源于莫迪政府力推的农业改革。莫迪政府在踌躇多年后正式起草了三部农业改革法案。这三项法案分别是《2020农产品贸易和商业法案》《2020农民价格保证协议和农业服务法案》和《2020基本商品修订法案》,主旨就是让农民自己去和市场打交道,政府不再提供保障。

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,农业在印度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。时至今日,农业贡献了印度15%的GDP,近六成的印度人以农业为主要的收入来源。同时,农民还是印度政治版图里重要的票仓。因此,自印度独立以来,为赢得选举也好,为保护本国市场也罢,历届政府依靠补贴、贷款和法律等在国内为农业打造了一个低效但全面的保护体系。其代表就是著名的“最低支持价格”(MSP)制度。

印度农业一直采取以统购统销为主的保护体系,农民很少与市场直接发生联系。农作物成熟后,农民把农产品卖给“官商合办”性质的农产品营销委员会,再由政府进行分配、售卖和出口。MSP制度能确保农民在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低于生产成本时不至于亏本。

但是统购统销,意味着农产品营销委员会具有某种类似垄断的特质。它们作为中间商掌握商品流通的关键环节,得利最多,而农民得利最少。政府虽借助委员会中的大商巨贾实现了价格的大致稳定,但不得不向农民支付巨额补贴,财政压力巨大。

莫迪2014年领导印度人民党掀翻国大党50多年的统治地位时,主打的口号之一就是提高政府运作效率、缩小贫富差距。但莫迪上台后,在靠废钞令等举措整顿治理、打击腐败的同时,不仅没有触碰被诟病已久的农业体系,反而不断给农民追加各种补贴。直至2019年莫迪连任,他终于对农业体系“动刀”。

此番农业改革方案的关键,就是改革原有的统购统销模式,把农民直接推向资本与市场,让他们与企业建立直接的买卖关系。同时,政府不再保证最低价格,把价格的决定权交由市场。莫迪表示,这一改革将赋予农民前所未有的自由,由于农产品营销委员会不再具有垄断地位,农民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。

但莫迪的说法并没能得到绝大多数农民的认同。在农民看来,莫迪的许诺犹如画饼。他们认为,面对占据资本和信息优势的大企业,小门小户的农民天然居于弱势地位,莫迪的改革只会

让农民彻底沦为资本的附庸,失去土地和莫迪承诺的自由。

说到底,绝大多数印度农民生存艰难,抗风险能力差,难以承受改革可能带来的“阵痛”,才有了这场印度版的“农村包围城市”。

折射内政不稳 抗议仍将继续

其实,莫迪的改革并非不合理。但农民拒不接受,除了经济原因外,还与复杂的政治社会背景相关。

首先,莫迪推动农业改革法案虽有法可依,却于理不合。正常情况下,像农业改革这样的重大事项,理当经过全面有效的讨论,在形成一定共识后再行推进。但莫迪改革方案的出台十分仓促。

莫迪在去年连任后虽不时通过各种渠道为农业改革放风造势,但民意反响惨淡。对此,莫迪没有正面应对,反而趁今年6月联邦议会休会期间,以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推动落实改革方案的某些内容。

9月20日,莫迪又凭借执政党印人党在议会上院的席位优势,强行推动改革法案过关。为防止执政联盟内的议员投反对票,莫迪一反惯例,要求使用公开投票的方式,迫使党内议员不得违抗自己。结果便是,投票进行时,议会闹翻天,当天会议被迫休会5次。

其次,反对党的推波助澜,以及部分既得利益者的煽动。在国大党执政的旁遮普邦,农民们从9月底就开始堵路抗议,该邦的部分铁路部门随即配合停止运营。在印人党执政的哈里亚纳邦,国大党从9月28日起就掀起为期一个月的抗议。到了10月,这里的国大党又发起一项签名活动,举行邦一级的农民会议以反对莫迪政府的农业改革法案。

在印度政坛根深蒂固的国大党表示,这些改革将毁掉农民、中间商和劳工的生计,让无数人破产。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。但民间支持改革的人认为,法案损害的只是中间商的利益,抗议的农民都是没文化、易受误导的贫农。只是从不少农民有条件驱车前往并长期驻扎首都看,这种说法也是存疑的。

坦白讲,为安抚农民,莫迪也做了功课。在与农民代表的谈判中,他答应保留MSP制度,并做

出其他妥协,但农民代表还是坚持要求废除全部的改革法案。农民之所以如此坚定,根本上是因为对莫迪政府的高度不信任。

今年6月,为了给改革法案出台造势,莫迪政府上调了本年度秋季作物的最低支持价格,以安抚民意。但由于今年印度陆续遭到旱灾与蝗灾的打击,莫迪政府上调的价格不仅低于实际市场价格,也无法满足农民的需要。

然而,印度经济本就陷入衰退,再加上受新冠疫情冲击,莫迪政府财政压力巨大,无法满足农民需求。而在反对党执政的多个地方邦,地方也没与中央就稻谷、玉米、花等主要农作物的最低收购价达成一致。

农民代表与莫迪政府的谈判已进行了数轮,但仍未达成协议。面对不愿妥协的总理莫迪,一些农民愤怒地表示,莫迪是希望拖垮抗议者,但他们绝不会放弃。

据《新民晚报》

相关链接

“最低支持价格”制度 保护农民不至于破产

“最低支持价格”(MSP)是印度官方设定的从农民手里收购23种农产品的最低价格。其用意是,无论市场行情如何,政府都会托底,保护农民获得最小的收益,不至于破产。

“最低支持价格”之所以被印度农民倚重,与印度农业的特点息息相关。

印度地处南亚次大陆,境内平原广布,河流众多,降水丰沛,是世界上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地区之一。

但是,由于印度地处热带季风气候,降水过于集中迅猛,再加上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匮乏,因此由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巨大。

印度农业以小农经济为主,农户年均收入低,抗风险能力差,对政府提供的补贴、贷款与保险高度依赖。尽管政府提供了慷慨的补贴和免税政策,但许多印度农民已陷入债务,自杀率上升。

莫迪改革切中传统体系低效的弊病,却无异于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。再加上莫迪政府数年来政策多变,也加剧了广大农民对于相关改革的担忧。

越来越多人晚婚 社会快速老龄化

韩国单人家庭占比首超三成

本报综合消息 韩国统计局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,2019年韩国共有近615万户单人家庭,占家庭总数比例首次突破三成,达到30.2%。这主要与越来越多韩国人晚婚和韩国社会快速老龄化有关。

韩联社报道,统计显示,2019年10月,韩国单人户家庭中,六成有工作。单人户家庭2018年平均年收入2120万韩元(约合12.8万元人民币),仅为家庭年收入整体水平的36.3%。八成单人户家庭年收入不足3000

万韩元(约合18万元人民币)。另外,38%单人户住月租房,30.6%有自有住宅。

截至2019年底,单人户的平均资产为1.6亿韩元(约合96万元人民币),平均债务为2000万韩元(约合12万元人民币)。

统计显示,自2015年以来,韩国单人户数量持续增长,当年在家庭总数中占比为27.2%。2018年,韩国单人户数量达到585万个,占家庭总数的29.3%。

此外,据韩国统计局今年9月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,韩国超

过309万名女性独自居住,约占单人户总数的一半。

韩国的晚婚现象愈演愈烈,初婚年龄已于2009年超过日本。数据显示,韩国去年初婚数量为18.4万,低于2018年的20万和2017年的20.61万。

韩国育儿政策研究所此前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,有结婚意向的20岁至39岁年龄段的未婚男女晚婚的主要原因是“收入低”。他们认为,结婚的必要条件是经济稳定。排在其后的答案依次是“独自生活更舒服”“觉

得还没到结婚年龄”以及“担心婚姻生活和工作难以兼顾”。韩联社分析称,韩国近几年经济不景气导致好工作难找、买房不易,不少年轻人选择晚婚,甚至逃避恋爱、婚姻和生育。导致总和生育率下降的其他因素包括孩子教育费用高、女性生育后再找工作难度大。

同样引发关注的是,韩国老龄化速度继续加快。统计厅2019年发布数据称,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数十年将骤减,预计2067年近一半韩国人口将达65岁及以

上。与此同时,韩国2019年总和生育率,即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为0.92,创下记录以来最低水平,意味着人口将继续下降。韩国2019年总和生育率是连续第二年不足1,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中唯一一个总和生育率不足1的经济体。经合组织成员平均生育率为1.63。

韩媒认为,虽然韩国政府在过去10年里投入了超过100万亿韩元的预算解决低出生率问题,但出生率依然在下降,政府需要出台更多措施来应对。